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右)向仇大雄頒發捐贈證書
大公報記者張帆攝

仇大雄先生及家人文物捐贈儀式 Ceremony of Chow Family's Donation

五月底的一個陰雨天，上海博物館一樓影視中心卻暖意融融——瑞士華裔收藏家仇大雄捐贈珍貴明清犀角杯的儀式在此舉行。出身於收藏世家，仇氏一門三代都赫赫有名。而仇大雄憑藉自己的努力，在犀角器領域取得了極大成就。此次的捐贈，他提出不限定數量與品種，由上博任意挑選。用他自己的話說，因為上博是「我們的家園，把我們的中國文化保存下來」。他還邀請了家族四代十多位成員專程來滬共襄盛舉，希望全家繼續支持文化傳承，代代相傳。

慷慨捐贈 不計數量

仇大雄之父仇焱之曾是上海灘上著名的文物商人，瓷器收藏在業內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上世紀四十年代晚期，仇焱之赴港發展，與敏求精舍的創始人胡惠春、徐伯郊等僑侶成為第一批南下的香港第一代收藏家。此後不久，仇家舉家移居瑞士日內瓦。

長期耳濡目染於父親的雅好，仇大雄也走上了收藏之路，並逐漸專注於犀角器領域。他回憶，犀角器收藏得益於父親的言傳身教。「父親於一九五九年在倫敦購入首件犀角杯，上雕赤壁山水圖，刻款紀年，自此廣集角器，往後二十載，他先後從倫敦、紐約、東京、香港及巴黎購入藝珍，至一九七八年方休。」而仇大雄自己的第一件個人收藏是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當年，他在德國慕尼黑看中一件犀角雕，與父親的第一件犀角雕藏品一樣，同為山水圖，且價值不菲。猶豫之際，受到父親的鼓勵最終買下。之後，他將這件藏品呈送父親過目，一向嚴厲的父親即找出舊牙刷小心翼翼地清潔上面的污垢，對於收藏和兒子的愛護之情可見一斑。

仇焱之逝世後，仇大雄為了紀念父親，也是出於對犀角器的熱愛，決定出資購下先父的犀角器收藏，從此更加堅定了鑒藏犀角藝術品的信念。愛爾蘭學者、《中國的犀牛角雕刻藝術》作者Jan Chapman曾寫道：「三十有五載，仇大雄已經成為一位真正的鑒藏家，他的收藏精美珍貴，絕對是他個人美學品味的反映。」

實際上，對於仇氏家族來說，收藏並不是為了能在拍賣場上爭艷，更多的是出於個人雅好和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反映到犀角器

領域，則更有濃厚的親情在。也正因此，仇家藏品豐富卻相當低調。

仇焱之生前所藏犀角器多用於品鑒、學習，甚少公開。他逝世後，才有為數不多的幾次專場拍賣。如二〇一一年四月，由仇大雄之子仇國仕策劃的「靈犀萬象——仇焱之、仇大雄父子珍藏犀角雕刻」專場。儘管十一件藏品成交價過億，但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仍然是犀角器中凝聚著的仇家親情。

相對於拍賣，仇大雄更加願意把自己的藏品用於公益。一九九七年，在當時的蘇富比專家朱湯生建議下，他曾將一批犀角器借予新落成的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展出，這一展就是近十年。此次向上海博物館的捐贈，他也特別提出不限定數量與品種，由上海博物館根據收藏和研究的需要任意挑選，上博最終選定了十件作品。

用料考究 巧奪天工

說物以「犀」為貴絕不為過。取材於犀牛角的犀角器，材料稀缺、工藝高難。近年來，犀牛作為瀕危物種之一，受到國際法保護嚴禁捕殺和用於貿易，這越發使得犀角器成為極其珍稀的藝術品類。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介紹，犀角器歷來受到各國藏家與機構的重視，但據研究統計，存世的中國古代犀角器僅有數千件，其中絕大多數流散在海外。由於價格昂貴，公立機構要入藏這些藝術品，收藏家的慷慨捐贈就成為最重要的管道，如愛爾蘭切斯特、比棧圖書館的二百多件、美國哈佛大學博物館的七十多件、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的五十多件中國古代犀角藝術品，均受贈於私人收藏家。

楊志剛說，現在收藏中國古代犀角器最多的地方是愛爾蘭的切斯特，比棧圖書館，而合併我國收藏犀角器最多的單位——兩岸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全部的犀角器收藏，也僅僅只有三百餘件，不足存世量的十分之一。這不僅意味著中華民族珍貴的物質文化遺產的失落，也導致國內對這一珍貴遺產的研究長期落後於世界水準。因此，仇大雄此次的捐贈對提高我國犀角器的收藏和研究水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楊志剛告訴記者，犀角雕刻藝術集中體現了古人物盡其用的價值觀念和巧奪天工的藝術創造力，到明清兩代達到巔峰。他說，

製作於十八世紀以前，也就是清前期及更早年代的作品本就稀少和珍貴，如果是署有款識的名家之作就更難得。此次上博獲贈的這十件作品，全部用料考究、雕刻精美，且八成是屬於明代和清前期的作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特別是其中兩件署有明末清初犀角雕刻名家周文樞的作品，代表了當時山水題材犀角雕刻藝術的最高水準，在學術研究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根據現行法規，犀角製品理論上是嚴禁進出境的。因此，仇大雄捐贈的這批犀角器最終來到上博，也牽動了國家文物局、國家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上海市瀕危物種等多家機構。經過多方協調，流散海外的國寶最終轉道香港抵滬，成就一段佳話。

勉勵家族 文化傳承

對上海博物館來說，當天的捐贈並非仇氏家族的第一次。楊志剛介紹，長期以來，仇氏家族與上海博物館保持着良好的友誼。仇大雄更曾促成上博與瑞士方面合作，成功舉辦多個展覽；也曾多次向上海博物館捐贈文物，包括漆器、瓷器和犀角杯等多個品類。

不過此次的儀式卻更顯特別，仇大雄稱之為「回家」和「家庭聚會」——仇氏家族四代十多位成員都專程趕來，其中最年長的是仇大雄的舅舅，已經九十八歲，最年輕的是他的小孫子，才兩歲半。他還在上海與夫人慶祝結婚四十五周年。濃濃的親情環繞着這批由親情滋養多年的犀角杯，讓現場更增暖意。

多年居住海外，連致辭也用英語，但仇氏家族骨子裡對中國傳統的尊重還是溢於言表。也正是出於這份尊重，才有了這樣的捐贈和聚會。正如仇大雄所說，藉着犀角器「回家」，也促成了仇氏家族多年難遇的大聚會。他說，多年來，在他心目中，上海博物館已經不僅是一個機構，也是「我們的家園」，是保護中國文化的家園。「雖然我們身在海外，但始終關注中國和中國文化。」仇大雄希望家人都支持「我們的文化」，支持上博，代代相傳。

編者按：除註明大公報記者所攝圖片之外，其餘圖片均由上海博物館提供

仇大雄犀角器珍藏贈上博

大公報記者 張帆



▲犀角雕雙戲小圓杯，明代

▼犀角雕鐘馗圖杯，清代



【小資料】 犀角器分三個流派

犀角器是以犀牛角為原料雕刻的器物。相傳用犀角杯飲酒可清熱解毒，所以，它便成為犀角器的主要器形。專家介紹，早在漢代，即有用犀角作裝飾及飲酒器具。經過千百年發展，犀角雕刻也成為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重要品類，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

犀角器還有非洲犀牛角和亞洲犀牛角之分。目前，亞洲犀牛角已經滅絕，因此格外珍罕，價值高於非洲犀牛角。現存的亞洲犀角雕刻作品絕大多數是明清時代的作品。亞洲犀角絕跡後，非洲犀角取而代之，則是在清中葉以後。因此，無論是材質還是工藝角度，明朝和清代前期的犀角器都最為珍貴。

在歷史上，中國犀角雕刻還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流派：一是北京派，代表宮廷藝術，取材厚、大，表現皇室題材，工藝精美，不計工本材料；二是蘇州派，工巧薈萃，講究文人氣息，多取材名家名文的題材，如蘭亭鵝詠、東坡遊赤壁等，用料次於皇家，以花卉為主，用料較薄。除了年代、材質、刻工外，是否有名家作者的留款，也決定了犀角器的價值。



▲犀角雕山水人物杯，清代



▲犀角雕雲濤海獸杯，明代



▲周文樞作，雕赤壁圖犀角杯，明末清初



▲犀角雕赤壁圖杯，明代



仇大雄(左二)和家人



犀角雕松鼠葡萄杯，清代

建館六十年 捐贈者逾千

「我們的家園」，仇大雄在談到對上海博物館的感情時，用了這樣一個詞。因着這份對「家」的情感，他不遠萬里將父子兩代收藏悉數交託上博，也不免引人勾引起對文博機構與藏家關係的思考。捐贈者的無私怎麼讚譽都不過分，而受贈者該如何回饋？上博延續六十多年的傳統給了我們有益的參考經驗——為捐贈者構築起物質和精神的共同家園。

從無到有 珍品薈萃

在上海博物館的前廳入口處，有一面引人注目的「捐贈牆」，上面按年度排列着捐贈人的名字，以此表達對捐贈者的銘記和感謝。如此大規模的捐贈者名牆，在內地的文博機構並不多見。上博的每一任館長在談到博物館歷史的時候，總會不約而同首先「感謝捐贈者」。

的確，「白手起家」的上海博物館，現有藏品百餘萬件，藏家的無私捐贈是一個重要來源——建館六十餘年，像仇大雄這樣慷慨的捐贈者逾千，他們捐贈的等級文物和一般藏品成為上海博物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不乏很多現在舉世聞名的鎮館之寶——大孟鼎、大克鼎由蘇州潘氏後人潘達于

主動捐贈；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後移居香港的胡惠春歷時三十多年多次捐贈珍貴瓷器三百餘件；全國聞名的王世襄藏明代傢具是由香港莊貴倫商請王世襄割愛後捐給上博；香港著名收藏家張永珍在蘇富比拍賣會上以四十餘萬港元的高價拍得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引起轟動，次年這件珍寶就被她捐贈給上博，並表示要讓它永遠留在自己的「家」裡，讓所有中國人都能欣賞到它的美麗與不凡……

銘記每一名捐贈者

上海博物館館長陳克倫告訴記者，堅持善待每一位捐贈者是幾代上博人的傳統。六十多年來，上海博物館逐步建立了文物捐贈管理制度和工作規範。

在榮譽嘉獎方面，除了名字刻上捐贈牆和展品的說明牌，很多捐贈者因為上博的申報獲得了政府部門的嘉獎。如菲律賓莊氏家族後人、杜維善夫婦、張永珍，都獲得上海市政府頒發的「白玉蘭榮譽獎」。在受贈文物的保管上，上海博物館以文物修復的技術優勢，進行修復和整理，分門別類使其發揮更大的社會價值；有的還會開闢以捐贈者名字命名的專室陳列，在一定的時間，還會舉辦專場展覽、專題研討會加強學術研究。

更重要的是，對於捐贈者來說，無論是生活上還是精神上，上博始終是他們的家園。捐贈者每逢回到上博，總能受到最高禮

遇，上博也會定期上門走訪、慰問。

陳克倫介紹，數十年來，讓捐贈者常感家的溫暖是上博人的重要工作：逢年過節都會舉辦聯誼活動，加深與捐贈者之間的溝通與友誼；及時了解掌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並在可能的情况下給予幫助解決，比如幫助改善他們的住房條件、醫療條件等。

以捐贈大孟鼎、大克鼎的潘達于為例，這兩件青銅重器曾被文物鑑定家徐森玉盛讚為「研究中國古代史和美術考古學的珍貴資料，它們在學術上的價值，堪與毛公鼎、散氏盤和虢季子白盤媲美。」捐贈後的潘達于卻始終生活樸樸，安於平淡，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從不曾向國家和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老人家高風亮節，但上博始終牢記着她的貢獻，時刻把她的事放在心上；老人一度沒有生活來源，上博即四處奔走，為她謀得一份工作；老人因病住院，上博立即讓老人換到最好的病房，並支付醫療費；為解決老人的住房困難，上博還為老人在蘇州市中心購置了一套三居室住房；老人過百歲生日時，上海博物館還特地舉辦「百歲壽星潘達于捐贈大孟鼎大克鼎回顧特展」，並為老人舉辦隆重的百歲壽慶，令她十分感動。

可以說，正因為上海博物館對捐贈者始終懷有這種真誠的態度，才有越來越多像仇大雄這樣的藏家信任上博、對上博滿懷家園之情，無私捐贈。